

论唐代科举制的改革及其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廖健琦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在唐代三百年的历史中,科举、教育、选举三者的关系颇为密切,其中又以科举和教育的关系为最。科举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多次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上,而这些改革的进行,对当时的教育尤其是官学教育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官学的教学(实际上就是儒家经典的教育)受到了影响,官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干扰;第二,官学中监官、学官的地位下降了,作用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官学的教育管理如学官的选任、生徒的管理出了问题,学校的重要性也随之削弱;第三,官学的发展受到影响,出现萎缩、停顿等发展的危机,同时,也使得儒学的发展出现危机。

关键词: 唐代;科举制;官学教育;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4)01-0109-05

作者简介: 廖健琦(1967—),男,福建永定人,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但真正取得发展是在唐朝,而且从唐代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径,要想取得官职,要想享受高官厚禄,参加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手段。”^{[1](P272)}“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2](卷六八)}。另一方面,与唐以前的朝代不同的是,唐代学校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并不能直接进入仕途,而是首先必须先参加由吏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主持),取得出身,再参加由吏部主持的铨选,合格了,才能被授予相应的官职。因此,唐代教育和科举制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

科举制经过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发展,到高宗和武后统治时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2](卷一三)}

至玄宗开元年间,各种问题又暴露无遗。先是在开元八年七月,时任国子司业的李元上疏论曰:“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

梁》,历代宗(恐误,或应为‘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3](卷七五)}至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时任国子祭酒的杨 又上奏道:“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4](卷一八五)}

开元二十四年春,发生了“中国科举制度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变动”^{[5](P95)},即科举管理权限由原来的尚书吏部员外郎转移至尚书礼部侍郎:“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6](卷四四)}。于是,是年九月,礼部以贡举权已转移,请别置印。十月,时任礼部侍郎的姚奕上奏,要求对进士科实行改革。至次年正月(《会要》作二月),统治者又颁布敕令,对明经科亦实行改革。这次改革的进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于是又进行改革:“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场者。天宝初,达奚、李严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恐误,或为‘诗’)放过,谓之‘赎

收稿日期: 2003-10-25

帖’”。^{[7](卷三)}至天宝十一载十二月,统治者又下诏曰:“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有厘革。”十二载六月八日,“礼部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3](卷七五)}纵观这几次改革,除了开元二十四年实行的是有关科举制的管理权限之外,其余的几次都是有关科举制的考试方法与内容的改革。本文针对这几次有关科举制的考试内容的改革,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就教于同仁。

永隆二年以前,由于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了“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6](《选举志上》)}的问题,即明经、进士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再深入学习儒家经典,掌握知识,只是在重复地做一种简单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永隆二年,时任考功员外郎的刘思立建言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实行改革。统治者接受了刘思立的建言,于同年八月下诏,对科举考试实行改革:“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3](卷七五)}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对明经举增加帖经的内容,而且要求举人在试帖达到取十得六以上的标准后方可试策。所谓帖经,即“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唯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8](卷一五)}相当于现代的填充法,意在考考生的背诵能力,而非为了加强考生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儒家微言大义的理解。进士举则增加试杂文的内容,所谓杂文,主要是诗赋:“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9](卷二)}在试杂文、识文律及格后方可试策。从此改革不难看出这样几点:首先,帖经成了明经举的重要内容,帖经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应明经举的考生的一生。只有首先通过了帖经考试,才有参加下一轮考试的资格。由此可见帖经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所在。而此项改革的施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反而给国子监的教学,给当时的儒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帖经增加前固然有考生忽视正经,只读疏义之弊存在,可是生徒们在读疏义时毕竟还得兼及正经,而且往往还得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帖经增加后,为了应付考试,生徒们固然仍需兼及正经与疏义,然而此时唯在诵记,连帖经增加前尚存的一点对正经的理解都荡然无存了。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深入推行,帖经所产生的

弊端也日益增多,所产生的弊端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射策时的不读正经、抄撮义条,而是情况更加恶劣,其最严重者有三:其一,“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3](卷七五)}“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例援。”^{[10](卷六三九)}由于考试实在太难,加之考生应试的目的主要还是在博取功名利禄,因此,为了把帖经应付过去,考生只好放弃对儒家经典的正常学习,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将考试对付过去,至于入监学习的本意此时已是全然不顾了:“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8](卷一五)}这即是说,由于负责明经举考试的机构在考试中实行走火入魔的帖经法,使生徒们在监学习时,惟诵记为能事,而于经文之本意、注疏之原意,则全然视而不见。这一方面使生徒们手捧儒家经典,却不知其所言为何,“其于平文大意,或多墙面焉”,使本已无甚突破与发展的儒学再一次遇上了危机;另一方面,生徒们惟诵记为能事,负责明经举考试的机构在考试中又往往不详求其述作之意,只是在考试的难度方面作文章,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国子监监官、学官的作用为之削弱,甚至有可能丧失,学官的地位为之下降。

因此之故,兵部郎中蒋武、考功员外郎刘伯刍、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颖、郊王府谘议章廷,接受诏令同赴国子监讲论。^{[3](卷六六)}检《旧唐书·职官志》与《唐六典》可知,兵部郎中为从五品上,考功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著作郎为从五品上,太常博士为从七品上,王府谘议为正五品上,国子博士为正五品上,太学博士为正六品上,四门博士为正七品上,广文馆博士为正六品上(按《唐六典》中无此条)。将其细细比较,便可很清楚地看出,其实学官并非真正的职位稍卑,而是由于唐后期在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明经、进士二科地位的升降等因素,导致了学官在人们心目中的职位稍卑——确切地说,应该是地位变得卑贱了,而职位并未改变,统治者出于统治的目的不便明说,故只能以此作为幌子,以掩饰学官地位卑贱的事实。既然最高统治者都这样看待学官,那还能对那些藐视学官、不服其管教的生徒说些什么呢?以致安史乱后在国子监中,竟然出现了生徒不服管理、滋事生非等丑恶现象:“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2](卷五七三)}其二,由于帖

经考试的增加,以及考试的难度成为明经科录取标准之定型,负责考试的机构不详求考生之述作之意,帖经越来越孤僻冷怪,越来越难,为了应付考试,考生在监学习时,又往往大行投机取巧之法以对付学习与考试,以便早日及第获得出身,这又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3](卷七五)]这对于当时的儒学教育来说是个打击,无论于国子监还是于儒学,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唐六典》卷2《国子监》有云:“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而为之殿最。”按常理,监官、学官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应依据《唐六典》的规定去行使自己的职责与权利,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可如今生徒们在监学习时却“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置《周礼》《左传》等于不顾,这种情况的发生,无疑会使国子监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干扰,使监官,尤其是学官的尊严与地位、作用与信心遭遇到挑战,“至有博士助教锄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2](卷五三二)],学官的自身素质也因之受到影响:“博士有倚席之讥”^[2](卷六四五)]。其三,上面说了,帖经实质上就是填充法,它并不要求生徒有很好的理解力和学习方法,只要求生徒有良好的记忆力、扎实的背功,这样一来,就使得学官的开讲也形同虚设,于务在出身的生徒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而生徒实质上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无心去听学官的讲论,岁月既久,枯燥乏味,毫无生气与新意的诵记学习生活,往往会使生徒产生严重的厌学之风:“生徒无鼓篋之志”^[2](卷六四五)]、“诸生无修业之心”^[4](卷一九〇)]这不仅仅影响到国子监正常的教学,而且也使学官的选任产生弊端:“庶官乏通经之学”^[4](卷一九〇)]。同时更使得当时的儒学陷入了危机之中。上引“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以及“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韩愈《答殷侍御书》也云:“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2](卷五五三)]即清楚地剖析了此危害性。

开元十六年,针对科举考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

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之类,时任国子祭酒的杨 提出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再实行改革:“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即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停止帖经的考试方法,而改用帖平文,目的在于挽救《周礼》《仪礼》《左传》《公羊》《谷梁》这五经于危机之中,尤其是要挽救儒家经学于危机之中。文中的大典即指儒家经学。杨 的建议在当时是否被统治者所采纳,由于史料的阙如,无法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帖经方法的实行,已经给当时的儒学教育,给当时的儒学带来了很多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刘思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初的一个建议,竟会给后世带来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给后世的科举考试、教育、儒家经学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开元二十四年,科举管理权限由原来的尚书吏部员外郎转移至尚书礼部侍郎,于是,同年九月,礼部以贡举权已转移,请别置印,至十月,时任礼部侍郎的姚奕上奏,请求对科举考试实行改革:“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3](卷七六)]至二十五年二月(《册府元龟》作正月),统治者下诏,对明经科与进士科实行改革:“二十五年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其明经自今以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迄,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须对同举人考试,应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免欤?”^[3](卷七五)]

从此条诏书可看出,帖经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次改革,依然离不开帖经,还重申和强调了帖经的重要性,提高了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这次改革,还是对开元十六年改革的一次反动。国子祭酒杨 在开元十六年提出,考试不应只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一类的东西,不应该不详生徒述作之意,只追求考试难度,而应该全部改为帖平文,目的在于存大典。这从考试的方法上来说,并没有变化,实行的都是类似于现代填充法的所谓帖,但是从考试的内容上来说,却发生了变化,一个帖经,一个帖平文,这是

很明显的 但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情况又发生显著变化,首先,统治者再次强调了帖经,而且要求进士科也实行帖经,“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者,通与及第。”原因在于“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取士选贤之道。”其次,虽然强调说“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取士选贤之道”,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其明经自今以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即要求明经科仍然实行帖经的考试方法,前后矛盾。其原因盖在于,帖经考试的方法实行既久,虽问题多多,然已深入人心,非一朝一夕可改,从上引杨 之建议即可看出其端倪。此外,当时统治者除了帖经之外似也提不出更好的考试方法,最起码的连一个较好的替代方法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完全废止帖经了。复次,除了再次强调帖经的重要性之外,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方面,第一就是要求应明经科的考生不仅仅要懂儒家经典,而且还要求他们“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也就是要求他们还必须懂得作诗的方法,当他们参加科举,通过了帖经、按问大义、答时务策之后,还要求粗有文理,只有这些都合格了,才能及第。从考试的内容来说,增加了试时务策,从考试的标准来说,则要求从原先的“文注精熟,辩明义理”,改为现在的“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帖经依然是挡在应明经科的考生们面前的一座大山,而试时务策和要求“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则是应明经科的考生们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座大山。而这座大山对于整天面对儒家经典、只惯于穷究经义的大多数考生而言,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第二就是要求应进士举的考生的帖经考试从帖小经改为帖大经,要帖如《左传》《礼记》一类的大经,大经相对于小经而言,份量大了很多,这无疑使进士科的考试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且,只有首先通过了帖大经的考试,才能参加接下来的试杂文等考试以至及第。此外,对于进士科,除了帖经内容方面的改革外,还在考文的标准方面实行改革,即从原先的“文须洞识文律”改为文取“华实兼举”,而对进士科所实行的这种改革,很明显的是针对当时进士科中出现的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的弊端而进行的。很显然,这次针对明经科和进士科实行的改革,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考试的标准来看,都“有将两科互相折衷调和、取长补短的用意。明经科试时务策,关于穷究经义的明经举人只好勉为其难,而时务策恰好是进士科考试的传统内容,是进士举人所擅长的;进士所短为帖经,却独独要增加他们帖经的分量,若帖大经不通则不许

进入二、三场的试诗赋及时务策。要求明经‘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要求进士‘华实兼举’正好是两科之间互补为用。此后,两科举人不得不更加勤奋备考。”^[5](P100-101)]这次改革的结果,除了使两科举人不得不更加勤奋备考外——关于此,唐人赵在当时即有论断:“若明试其业,主张其文,核能否于听览之间,定取舍于笔削之下,职在考功郎。后至元宗开元二十五年,重难其事,更令春官小宗伯主之,而业文志学之士知勤矣。”^[2]——就是增加了两科举人考试的难度和被录取、及第的难度,这是因为,对明经科的考生而言,他们只惯于穷究经义,从来对他们的要求是“文注精熟,辩明义理”,而现在却要求他们免试经策,改答一点都不熟悉的时务策,同时不再要求他们“文注精熟,辩明义理”了,而是要求达到“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的标准。本来帖经已经够难的,现在还要加上根本就是全新的应试内容,可以说明明经科的考试与及第难度越来越大,这对应明经科的考生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仅从国子监的生徒方面来看,他们平常所学主要是儒家经典,很少涉及文学辞章,生徒们的专长在经学,不在诗赋辞章,在作诗赋方面,他们是难以和成天吟诗作赋的乡贡们相比肩的。另一方面,时务策为进士科之传统考试内容,而明经只惯于穷究经义,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而科举考试又要求应明经举的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并答时务策三道,在国子监中欲提高文学水平几为不可能,国子监的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间就必然产生这尖锐的矛盾冲突,当这种矛盾冲突无法解决时,就会使得入监学习成为不必要(甚至是一种负担),学校的重要性为之削弱,只能使生徒纷纷离去,国子监出现寂寥冷清之景,并渐渐走上衰亡之路。唐中晚期出现的“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2](卷五四九)]这种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除此而外,州县学所学亦多为儒家经学,想在州县学中提高吟诗作赋的水平也是难以为之的,于是,州县学也为之衰弱,使国子监的生源受到影响,间接的对国子监产生危害,这便是为什么韩愈在当时提出,要求统治者放宽生徒的入学等级限制,允许一定数量的低级别官吏的子弟到高一级的学馆去学习的原因所在:“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2](卷五四九)]。而国子监生徒的流失与生源的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使国子监的学官受到影响,都会使学官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良的反应,“至有博士、助教、锄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

郊。”^{[2](卷五三二)}、“儒硕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2](卷六四五)}。更严重者,如唐人所言,会产生“所谓德宇将摧,教源将乾,先圣之道将不堪。犹火之炎上,至焚,其为不利也,岂不畏哉?”^{[2](卷五三二)}的可怕后果。而对于进士科的考生而言,由于他们以前只要帖小经,而且考文的标准是“文须洞识文律”,可如今却要求他们改帖大经,分量增加了,难度也因之增大,同时考文的标准也改为了“文取华实兼举”,他们所长在诗赋方面,所短在帖经方面,不是扬其长避其短,而是扬其短避其长,这于“多于经不精”^{[7](卷三)}的文学之士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文学之士的登科比率大大降低。这显然与统治者广招贤才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也与当时整个社会以进士为士林华选的潮流相乖。自然的,对于国子监的教育来说也同样会产生危害。为改变此种不利的情况,尤其是为了让天下英雄进入统治者的收罗范围之内,且顺应社会的潮流,于是又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革主要是针对进士科进行的,而对明经科根本就没有实行。“天宝初,达奚、李严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恐误,或为‘诗’)放过,谓之‘赎帖’。”^{[7](卷三)}即对那些帖经不合格、文名却高的进士实行特别的优待,允许他们可以试诗取代帖经的成绩。“赎帖”的推行,对那些“多于经不精”的进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对于开元二十五年的进士科改革来说却是一次彻底的否定——虽名为只与文名高者以此待遇,但从当时科举考试中请托盛行等事实来看,恐非如此——这样,它的实行,又使应进士举的难度减小,使从前一度实现的劝学效果化为灰烬,士子们只要努力在作诗赋方面多下苦功,努力提高自己的作诗水平,又何愁不能获得出身?于是,学风又坏,刚有些起色的教育又开始陷入困境之中。至少从国子监来看是如此。国子监教育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与

考试传统及其学科特色是,教学、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学科特色表现为儒家经典教育,而科举考试的改革,却要求应举的生徒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并答时务策三道,传统教学内容与学科特色方面的制约,使在国子监中欲提高文学水平几为不可能,国子监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间,便形成一种无法解决的尖锐矛盾冲突,这不仅使入监学习成为不必要(甚至是一种负担),学校的重要性为之削弱,学官的地位为之下降,使得生徒们为了早日及第,也不得不纷纷离监而去,使国子监的发展出现问题。同时也使得国子监在教育管理方面出现种种问题。而教育管理方面问题的出现,又使得国子监中学风败坏等问题层出不穷的产生。

上面说了,在开元二十五年的科举改革中,帖经被再一次地强调,对帖经考试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但是问题依然很多。于是统治者在天宝十一载十二月、十二载六月八日又对帖经进行改革:“礼部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礼部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3](卷七五)}这些都主要针对帖经的方法进行,可以看出帖经考试的方法已经是深入统治者的心了。

参考文献:

[1] 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与朋党 [A].隋唐五代史论集 [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 全唐文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 唐会要 [M].北京:中华书局,1955.
[4] 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刘海峰.唐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综论 [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6] 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封氏闻见记 [A].文渊阁四库全书 [Z].
[8] 通典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徐松.登科记考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册府元龟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 in Tang Dynasty

LIAO Jian-qi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In Ta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has an close bearing on the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it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each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Ta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official education; negative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孙景峰]